

# 关于鲁迅早期文言论文的海外学术反应

[澳]寇志明 作 侯大千 译

1906 年,后世公认的中国现代文学奠基者鲁迅(1881-1936)从医学专门学校退学,回到东京,开始着手研究文学并撰写五篇较长的文言论文。论文的复古文体受反主流的反清语言学家章太炎(章炳麟,1868-1936)在其主持的《民报》上发表的文章的影响。<sup>①</sup>鲁迅在 1936 年仍曾公开表达对章太炎的敬仰之情,主要缘于章直面当时的中国强权,始终坚持毫不妥协的反对立场。<sup>②</sup>

章太炎于 1906 年 7 月至 1908 年 10 月任《民报》主编。他选择那种古文,这本身就是一种鲜明表态。鲁迅摒弃了清代特色、讲究润饰的骈文,但也拒绝流行的“新民体”,即梁启超(1873-1929)在其主持的《新民丛报》中使用的现代化的浅近文言文体。笔者曾撰文指出,鲁迅试图通过回归汉(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20 年)、魏(220-265)、晋(265-420)时期的古文,创造一种更为纯正的“中国”风格的文体;他同时尝试以散漫文风承载现代概念,并在听觉和词汇上接近古书,与其道德、智性权威产生共鸣。<sup>③</sup>

鲁迅以“令飞”和“迅行”为笔名,在《河南》杂志上发表了五篇论文和一篇译作,顺序如下:

《人[间]之历史》,令飞,《河南》第 1 号,1907 年 12 月,第 85-96 页;<sup>④</sup>

《摩罗诗力说》,令飞,分两部分连载于《河南》第 2 号,1908 年 2 月,第 70-90 页、与第 3 期,1908 年 3 月,第 45-74 页;<sup>⑤</sup>

《科学史教篇》,令飞,《河南》第 5 期,1908 年 6 月,第 76-89 页;

《文化偏至论》,迅行,《河南》第 7 期,1908 年 8 月,第 1-18 页;

《裴彖飞诗论》,译作,迅行,《河南》第 7 期,1908 年 8 月,第 65-72 页;

《破恶声论》,迅行,《河南》第 8 期,1908 年 12 月,第 16-31 页。

中国部分读者之所以一直认为这些论文重要,一定程度上是由于 1926 年鲁迅在编选其第一部杂文集《坟》时将大部分(上文中的前四篇)收录其中。鲁迅于 1926 年 10 月 30 日“大风之夜”<sup>⑥</sup>(可能象征当时中国危机四伏的政

治局势,也是鲁迅离开军阀统治的北京的原因之一)在厦门写毕《坟》的《题记》,《题记》中有言:

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sup>⑦</sup>

鲁迅意似暗指他看到的是对“五四”精神的镇压及“新文化运动”的终结。在《题记》中他还进一步谈到,应该继续抗议1926年3月18日军阀政府在执政府门前对手无寸铁的请愿者的屠杀,这些请愿者大多是学生;同时,他也希望通过出版《坟》这部文集,继续反击军阀政府的辩护者。实际上,读毕《题记》,笔者怀疑文集书名“坟”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是指要“埋藏”他的早期作品,而是实际暗指请愿者的牺牲。<sup>⑧</sup>

鲁迅早期论文用的古文的难度无疑阻碍了读者的阅读,因此后来被翻译成白话文。1976年,包括洪桥<sup>⑨</sup>在内的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研究小组完成了第一个译本<sup>⑩</sup>,该译本未公开出版(可能因为洪桥曾被扣上了胡风(1902-1985)“右派”反革命集团的帽子)。1978年,夏志清眼中“最优秀的鲁迅传记作者之一”,鲁迅研究者王士菁再次对这些论文进行翻译。<sup>⑪</sup>次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教授赵瑞蕻(1915-1999)又将其中最长的一篇《摩罗诗力说》译成白话文。<sup>⑫</sup>当时最著名的美国鲁迅研究者之一威廉·莱尔(William A. Lyell)指出,完全可以为这篇《摩罗诗力说》论文单独写一本书。赵瑞蕻在1982年也的确这样做了。赵在书的长篇后记中表达了对《摩罗诗力说》的看法,称之为鲁迅对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宣言:

鲁迅最初想提出的文艺运动,不是别的运动,而就是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

的文艺运动。《摩罗诗力说》最集中地反映了鲁迅这时期的思想感情和文艺观点,他的美学倾向。《摩罗诗力说》就是这个文艺运动的宣言,或者可说是它的纲领。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摩罗诗力说》看成是近代中国革命浪漫主义的文学纲领,虽然它主要是介绍、评论西欧和东欧几位最有代表性的,影响最大的浪漫派诗人,但其中也十分可喜可贵地结合着鲁迅当时对自然界,对时代、社会、对当时所理解的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对人生和艺术的观点。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把《摩罗诗力说》列入世界浪漫主义的文献宝库中。<sup>⑬</sup>

但是,笔者认为,在此之外,《摩罗诗力说》另有深意。鲁迅在文中重新评价了中国文学遗产,大体概述了十九世纪东、西欧诗歌,介绍了拜伦(1788-1824)、雪莱(1792-1822)及普希金(1799-1837),高度评价了莱蒙托夫(1814-1841)和密茨凯维奇(1798-1855),并将裴多菲(1823-1849)奉为经典;他解读了“恐怖主义”<sup>⑭</sup>,并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新诗学做出了设想。

1983年,何乃英将北冈正子(Kitaoka Masako)探讨鲁迅《摩罗诗力说》材源的文章选译成中文,作为单行本出版。<sup>⑮</sup>1984年,赵瑞蕻阅读了北冈论文的中译本,并在笔者协助之下找到《摩罗诗力说》更多的英文材源之后,出版了其专著的修订本。2006年,北冈将自己早期关于青年鲁迅的文章进行修改,后结集出版。<sup>⑯</sup>2007年,洪桥《摩罗诗力说》白话文译本几经修订,终于宣布即将正式出版。<sup>⑰</sup>

2007年秋天,汪晖在纽约大学发表演讲,解读鲁迅1908年论文中的最后一篇:《破恶声论》<sup>⑱</sup>。演讲以论文形式发表,题为《声之善恶:什么是启蒙?重读鲁迅的〈破恶声论〉》,而后被译成英文。<sup>⑲</sup>汪文指出,这篇论文最全面地阐明了鲁迅对中国传统与现代性

之关系的复杂看法,尤其揭示了他使用文言<sup>②1</sup>进行激烈的社会批判、质疑众数统治和绅士阶级领导的反迷信启蒙运动的原因。

这些使用复古文体、看似“过时”的论文,为何在发表之后的百年间仍能持续激发中国知识分子的兴趣?<sup>②2</sup>笔者认为原因在于,它们作为鲁迅未来文学事业的发展蓝图,清晰、明确地展现了鲁迅一生坚持的立场。著名鲁迅研究学者王得后认为,早期论文可被合并看作同一本书的各个章节:鲁迅从《人之历史》中的“人”入手,转向《科学史教篇》中的科学、《文化偏至论》中的文化史,继而研究中、西方文学(《摩罗诗力说》),最后以1908年《破恶声论》中的宗教观收尾。<sup>②3</sup>

孙拥军指出,一些学者认为早期论文“构建起鲁迅思想发展的两条线索:即由人的发展而至社会的发展,由器物层的发展而至精神层的发展,标志着鲁迅‘进化论’思想和‘立人’思想的渐趋成熟”<sup>②4</sup>。不论将来的学者是否同意这些分析,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鲁迅早期论文构成了一个宣言,不仅关乎其文学事业,也关乎其知识兴趣。不过,这是笔者另一篇文章<sup>②5</sup>以及即将问世的新书的主题。新书也将收录笔者所译鲁迅的四篇早期论文。<sup>②6</sup>本文拟集中讨论鲁迅早期论文在海外学术圈的接受情况。

二十世纪日本汉学界最大的疏漏之一,可能是竹内好 Takeuchi Yoshimi(1908-1977)在分析鲁迅的生涯及作品时,将早期论文排除在外。<sup>②7</sup>竹内表示,他想分析的是鲁迅“不动”的一面,他在他的名著《鲁迅》(1944年)中写道:

许多批评家想说,鲁迅在这个时期(1930年代早期)完成了转变(中略)这个转变,可以用诸如从进化论到阶级斗争说、从个人到社会、从虚无到希望以及其它的词汇来说。我并不认为没有象那些词汇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情形。不过,我不同意认为它们是某种决定性的东西

的说法。<sup>②8</sup>

我关心的事,不是鲁迅如何变化,而是鲁迅为何没有变化。他变了;但是,他又没有变。就是说,我在不动之中来看鲁迅。<sup>②9</sup>

《鲁迅》作于1943年,初版于1944年。竹内坚持认为早期论文是鲁迅不成熟阶段的作品,因此未对其进行研究;他选择从鲁迅在北京的创作阶段(1918-1926)入手,研究其“不动”的一面。在笔者看来竹内是刻意为之,因为这么做对塑造鲁迅的文学家形象至关重要。如果论及早期论文,竹内就必须承认,鲁迅是一名文学家,也是一名思想家;这样会打乱他整部论著的逻辑(但未必会动摇竹内主张在战后日本树立的鲁迅的正面形象)。该“竹内鲁迅”形象屡遭丸山昇等多名学者质疑,但直到1960年代末,鲁迅的早期论文才开始被日本学术界认真对待。这种转变一定程度上缘于北冈正子在日本杂志《野草》上发表的对《摩罗诗力说》文本材源的研究成果,以及她与中岛长文(Nakajima Osafumi)的学术互动。互动是以1973年6月后者在《狂飙》学报发文评论北冈论著为开端。<sup>③0</sup>

几年之后,北冈在《野草》中提到,激发她开始相关研究的,是某些学者在未进行详细考察的情况下就对鲁迅早期思想和论文作出的泛化评论。

我开始作《材源考》,因为想知道鲁迅都用了哪些材料,又是怎样将它们组合到一起的。我考察鲁迅(早期)的思想和措词,因为想知道它们是不是他的原创。此外,我(也)可以告诉(读者),激发此项研究的原因之一,是我不喜欢的一种治学态度:某些人未经详细考察,就对他们声称的真正的鲁迅早期文学思想发表看法,滔滔不绝、言之凿凿。所以,我的首要考虑是注重经验事实。至于发表观点和主张,(我觉得)可以在

(确立事实)之后进行,首先要尽可能完全地找出材源;我的次要考虑是,了解鲁迅从何处得知这些材料,以及他拒绝使用哪些材料。此外,我还想通过阅读摩罗诗派的作品,分析其内容与鲁迅文学是否相关、如何相关。在进行以上工作的过程中,我一直告诫自己,抵拒直觉和预设立场的干扰,使用事实语言,谨慎落笔。<sup>⑩</sup>

关于日本学术界和北冈正子,笔者稍后再进行讨论。为了按时间顺序研究鲁迅早期论文的学术反应,我们应将目光转向美国。时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讲师的王际真(1899-2001),抗战时曾翻译鲁迅小说并以《阿Q及其他》(*Ah Q and Others*, 1941年)为题结集出版,他在序言中提到鲁迅早期论文:

这些论文刊登在并不出名的学生杂志上,在当时反响甚微。1929年虽与其他作品一同被收入《坟》中出版,迄今读者可能也不过寥寥。究其原因,首先在于论文不只是用文言文写的,他还用很艰奥的古文,但真正的原因在于,即便在今日(的中国),文章表达的仍是少数异己分子的观点。<sup>⑪</sup>

基于对《河南》杂志发行量的推测,以及《摩罗诗力说》等论文在杂志中的显要位置,鲁迅早期论文在发表之初读者寥寥这一说法,最近在中国学术界已遭质疑。邹鲁认为《河南》杂志当时“(中国)内地销行亦广”,估计国内“每期售至万份以上”。<sup>⑫</sup>且这一数据只是销售量,一书传阅多人的情况未考虑在内,因此杂志影响力可能会更大。但王际真最后的观点更值得玩味,他指出早期论文反响甚微,真实原因并非其古文辞藻,而是由于“即便在今日,文章表达的仍是少数异己分子的观点”。笔者认同这种说法,因为研究鲁迅早期论文时,我也有过类似遭遇。仅举一例,1981年9月起我以高级进修生<sup>⑬</sup>的

身份在北京大学学习,在中文系主任列席的一次见面会中,我说自己对研究鲁迅早期思想感兴趣,却遭喝止。“早期思想?”系主任<sup>⑭</sup>怒喝道,“我认为他的后期(按:英文原文中为斜体)思想才有意义。”当然,从当时的正统观念看来,青年鲁迅的资产阶级身份较为尴尬,因此唯有他的后期思想,即所谓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后的思想,才值得严肃探究。实际上,当初因为选择这个研究课题<sup>⑮</sup>,我险些不能进北大学习。<sup>⑯</sup>但是,与青年马克思的情形相似,官方对青年鲁迅的否定却激发了今日中国学者和读者的兴趣。而对我而言,研究早期论文意味着尝试追溯过去,定位和定义鲁迅早期思想中的观点。这些观点后来组成更深层次的结构,继而塑造了鲁迅一生的信念。换言之,我想质疑并颠覆鲁迅思想发展的阶段划分——即描述鲁迅如何从一个破落绅士家庭的普通男孩,成长为清代末年研习现代科学的爱国学生,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进化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最终成为一个给延安发贺电、公开抨击托派分子、给毛主席送火腿罐头的毛泽东主义者。<sup>⑰</sup>

王际真之后,西方学术界对鲁迅早期论文的再度研究,出现在陈夏珠(Pearl Hsia Chen)在1953年向芝加哥大学递交的博士论文《鲁迅的社会思想》(*The Social Thought of Lu Hsiang-shan*)中。文章使用较长篇幅讨论鲁迅早期论文,将晚清对西方影响的反应分为三派:以满清皇族荣禄(1836-1903)为首的反西方保守派;以张之洞(1837-1909)为代表的温和改良派;<sup>⑱</sup>以及激进改革派。陈夏珠在讨论第三派时写道:“鲁迅,作为激进改革派最直言不讳的领袖,代表着与传统主义真正的决裂,象征着新中国……他是最先对中国传统制度和观念的根基提出质疑的知识分子之一。”<sup>⑲</sup>论文成书出版时陈修改了她的观点,<sup>⑳</sup>我认为可能与舒威霖(William Rudolph Schultz)对她的批评有关。舒在他的博士论

文《鲁迅：在创造年间》(Lu Hsiün: The Creative Years, 华盛顿大学, 1955 年)中, 写道:

1918 年《狂人日记》发表前, 他(鲁迅)其实寂寂无名, 不可能是公认的“激进改革派最直言不讳的领袖”。此外, 直言不讳、言辞叛逆是他的失败之处, 一定程度上导致他当时的作品几乎无人问津。那些年间, 从任何意义上讲他都不算个领袖; 至于是否如陈所写, 这一阶段的他真正质疑过中国制度和思想的“根基”, 问题更大。在(陈)论文的第 43 页, 鲁迅被称为典型的“西方意识形态的中国皈依者”。若皈依者的意思是按照传统思想框架诠释新吸收的观点, 这一提法尚有其意义。鲁迅早期论文还遭遇过更极端的解读。王冶秋(91-94 页)是在毛泽东思想框架中研究鲁迅生平思想的典型学者。基于鲁迅的早期论文, 他指出鲁迅并不是头脑空空的理想主义者, 而是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 在这些论文中就已预见到毛泽东“新民主”的基本思想。<sup>⑪</sup>

分析早期论文时,<sup>⑫</sup>舒用“文化保守主义”描述鲁迅的观点:“早期论文既缺乏时代所需的革命热情, 反而支持违背普遍趋势的思想, 因而未给他带来认可或追随者, 且在匆促虚浮的社会气氛中很快被人遗忘。”<sup>⑬</sup>(按: 粗体为笔者所加(下同))。

然而“违背普遍趋势的思想”指什么呢? 舒从关于科学的两篇论文《人之历史》和《科学史教篇》入手进行解读:

文章的主题是将科学与人类的发展相联系, 并且指出民族生存依赖的两个基本因素: 对科学知识的获取与传播, 和对强大的内在精神即民族主义爱国热情的培养。与传统的形而上学框架相比, 达尔文进化论及其道德和社会外延, 作为科学探索的产物, 更能为鲁迅推崇的

人道主义观提供坚实的基础, 也为其坚信人性本善至美提供了更理性的根据。<sup>⑭</sup>

也就是说, 舒认为鲁迅的人道主义观一部分源自西方。不过, 关于这一点, 当代大陆学者郜元宝可能并不认同。<sup>⑮</sup>

但舒威廉认为鲁迅“并不比其上一代更明白中华民族当时面临的文化危机的本质, 他被限定在当时的参考框架之内, 认为国家问题的根源基本在其外部”。<sup>⑯</sup>鲁迅这里的局限与张之洞相似,<sup>⑰</sup>在《文化偏至论》(舒英译为 A Discussion of Cultural Obliquity)中, 鲁迅“没考虑到国内社会和经济制度的衰退, (且)认为中国要恢复其昔日荣光, 只需注入新的活力, 及其他适应中国特殊条件和需求的西方物质元素”<sup>⑱</sup>。鲁迅“直接抨击了‘以习兵事为生’的‘夫子’, 意似影射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 他也批评主张‘制造商估立宪国会’的人, 意指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派。两个派别都代表温和的文化措施, 但都被指责为追求个人报酬和权力的利己主义者”。<sup>⑲</sup>舒继续写道:

【鲁迅】的本意不在于探讨建立现代工业结构和国会统治是否毫无必要, 而在于指出相比上述人物关注的显性标志, 现代化更需要其他因素。在这方面, 鲁迅的思想似乎比他的同代人更有深度。<sup>⑳</sup>

这就是鲁迅对工业化、国会等现代化显性标志所持的怀疑态度。此外, “他指出上述两派试图引进的物质主义和众数统治, 不能代表西方最先进的思想”。<sup>㉑</sup>在鲁迅看来, “神思宗之至新者”<sup>㉒</sup>代表西方思想的前沿, 这也与他本来的信仰恰巧相符。舒认为:

反对物质主义, 回归精神层面必然导致对“群氓”的不信任感, 在这种思维之下, 不论鲁迅自己察觉与否, 他都比同代人思想更加保守。他不信任物质主

义,认为单凭它不能维护国家主权;他也不信任、甚至一直深深憎恶众数统治。他自信地宣称,在西方,这些观念已被更前沿的哲学成果所取代。<sup>⑤</sup>

基于上述讨论,舒威霖继续指出,鲁迅的人文主义思想是当时东西方知识融汇的产物。他首先引述《文化偏至论》:

故所述止于二事:曰非物质,曰重个人。<sup>⑥</sup>

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掇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sup>⑦</sup>(按:舒威霖在原作中标注为斜体)

然后解释道:

他全力支持的这一基本人文主义学说,是人性本善的传统信仰和十九世纪中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折衷产物。前文提到鲁迅曾向弟弟推荐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作品,因此在他身上发现这种社会哲学的基本元素不足为奇。个人主义,作为自由主义哲学框架的楔石和浪漫主义的遗产,在他身上也得以充分体现。<sup>⑧</sup>

舒威霖随后考察了鲁迅的“立人”思想,他将“立人”翻译成“the establishment of man”(人的立世)。他再度引鲁迅文:“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sup>⑨</sup>,并总结道:

接受了生物进化“法则”及其人类至美的尼采主义外延之后,他相信,如果一个社会能够普及思想自由、行为自由,那么在科学和人与生俱来的天赋的作用之下,社会与政治必将向前发展。与前文提到的贵族拜伦一样,出身上层阶级的鲁迅敬畏人的个体,但轻视人的群体。

从他此时类似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思想来看,“人”是一个概念、一个理想;但人的群体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他这一阶段的思想与十九世纪欧洲自由主义相近,对科学、进步和人持不可知论,痛恨压迫和伪善,并时刻警惕众数统治和群众心理。<sup>⑩</sup>

也就是说,当时鲁迅阅读了若干欧洲著作的中、日、德译本,并深受其影响。但他倾向于认同的是一种符合其自身(先前)思想趋向的欧洲自由主义,而非“皈依”一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

舒威霖没有讨论《破恶声论》;因为在他看来此文“未完成”,鲁迅也未将其收入《坟》中。他研究了《摩罗诗力说》,但详细程度远不及《文化偏至论》。他指出:

鲁迅选择了中间立场,既不认为文学作为艺术的分支唯一目的就是愉悦感官,也不认为文学的功能完全是说教。他认为二者兼有:文学手段唤起并激发愉悦的反应,而其功用在于指导和促进行动。因此,我们看到鲁迅为达到其坚持的目标,即通过文学手段激发国民精神,转变成一个犀利尖刻、社会目的明确的文学家,但他从未忘记文学基础的、潜在的价值。<sup>⑪</sup>

上文准确总结了鲁迅在唯美主义和教训主义之间的立场。但《摩罗诗力说》中的鲁迅显然站在社会现状的对立面,同情反对当权者的恶魔(恶魔=反抗领导的);他也显然超越了民族主义,走向国际主义精神。这些舒威霖都没有讨论。我认为这并非他的疏漏,而是由于写作时冷战的时代背景,抑或他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毋庸置疑,即便存在不足之处,这仍是一部非凡的作品。可惜舒威霖没有时间将他的博士论文修订而编入美国图威恩世界文豪丛书(Twayne's World Author Series)以专著形式正式出版(他是该丛书中国

作家部分的编辑,持有《鲁迅》一书的合同,但这个出版社早就倒闭了)。

密含芮(Harriet Mills, 1920-2016)是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1949年许多外国学者离开中国后,她继续以富布赖特学者的身份留在北京大学交流。她本应是舒威霖的同级,却在1951年9月因被疑为美国间谍,与李克(Allyn Rickett)、李义安(Adele Rickett)<sup>⑩</sup>先后在北京被捕入狱。1955年底她回到纽约,花费两年从结核病中恢复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63年,她的论文《鲁迅:1927-1936,左翼那些年》(Lu Hsiin: 1927-1936, *The Years on the Left*)才正式在哥伦比亚大学通过。密含芮在论文中对鲁迅早期论文进行的研究很值得注意。她在论文开头写道:“1907年12月到1908年12月间,鲁迅在学生杂志《河南》上发表了四篇论文,这也是他原本想用于《新生》杂志的四篇文章。论文使用鲁迅后来的老师章炳麟提倡的艰涩文体,在当时关注者甚少”。她引王际真在《阿Q及其他》中的前言为证,指出:“鲁迅留日时期的作品,如他后来所说,过分繁复艰涩,深受章炳麟及早期著名翻译家严复(1853-1921)的影响。”她继续写道:“这些论文颇有意思,因为它们展现了辛亥革命前三年鲁迅的知识和思想。”<sup>⑪</sup>

密含芮称《文化偏至论》为“论文中最醒目的一篇”,认为它体现了鲁迅的文化发展理论:

与讲科学史的论文相似,这篇论文主张平衡的发展。鲁迅认为,文化通过修正旧实践、满足新需要获得发展。在此过程中,旧实践的缺点被过分放大,钟摆则摆向其极端对立面。打破对立局面才能带来发展。法国大革命打碎了中世纪神权统治、君权神授的枷锁,以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取代之。自由和平等转而被推行至极限,则一人暴政被“百万群氓”的暴政取代。他指出,在物质领域,工业

革命带来了物质主义和科学的无限信赖,反而限制了人的精神本能和创造天性,阻碍了科学假设的生成(中略)

鲁迅描绘了十九世纪的思想家们在面对群体暴政和永不满足的物质主义等极端现象时,是如何作出反映,强调个体和精神的。他认为这些才是二十世纪的智性主流。鲁迅引述了倡导精神为重的理想主义的黑格尔,以保守人道主义反抗工业革命冷漠的经济力量的沙夫茨伯里勋爵、进行有力抵抗却不合时宜的施蒂纳、叔本华、克尔凯郭尔、易卜生,以及嘲讽传统,褒扬个人创造力的尼采。1908年的鲁迅深受尼采影响,将希望寄托在少数卓越人物,即“超人”,而非群众身上。<sup>⑫</sup>

密含芮随后引译了《文化偏至论》中的一段:

故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彰。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sup>⑬</sup>

然后分析道:

他认为中国需要这样的卓越人物。今日中国之羸弱,皆因数个世纪以来从未遭遇过挑战。没有任何力量让钟摆朝新的方向摆动。他觉得中国的救赎在于卓越人物的全面自由发展。只有这样的人能看清世界形势,也只有他们能选择适合中国的道路,引领她成功走向改革。他借此暗示自己既不支持只主张引进西方军事及技术知识的一派,也不赞同倡导梁启超立宪改革的一派。<sup>⑭</sup>

密含芮继续讨论《摩罗诗力说》,指出鲁迅在这篇论文中“提出文学的功能是培育智性、促进精神觉醒。文学的情感力量能展露科学所不能描绘的生命细微隐秘。之前论文中的反抗精神在此文中也得以充分展现。摩



罗是印度教的毁灭之神,鲁迅用‘摩罗诗人’这一称谓描绘那些不管世间阻力多大,仍引领人类前进的革命领袖”<sup>⑤</sup>,随后她进行了关键的综合评价,将鲁迅和他的同侪进行对比:

在时代语境之下,早期论文展现了鲁迅这一代人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智性分歧。孙中山“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革命发展势头向好,学生们不再像梁启超一代那样,关心如何为其改变儒家传统的要求辩护。鲁迅从未主张过认可儒学,他属于革命派。

同时,鲁迅身上也有类似梁启超的东西。最显著的一点是他在早期论文中从未彻底谴责中国传统,或称其毫不人道、令人痛苦,对其进行抗拒。这些要来得更晚。鲁迅的沉默以及他对选择性借鉴西方的做法的辩护中,隐含的是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他知道中国需要跟上时代,但认为适应现代世界也需要中国精神。鲁迅赞同梁启超,认为国民若不真正改变,中国必将劫数难逃。然而梁启超主张的是唤醒四亿人的智慧、德行和力量,鲁迅则认为关键在于少数卓越人物。受黑格尔影响,鲁迅认为打破极端才能带来发展,这与梁启超的观点,即世界上所有的现象都受保守和激进两大原则支配,不无关系。与梁启超一样,鲁迅告诫读者,要提防对西方文化的肤浅迷恋。

对照西方思想发展历程即可发现,鲁迅早期论文明显遗漏了整个社会主义思潮,而二十年后他又对社会主义表达了自我认同。社会主义思潮一度攻击了他所褒扬的个人主义。这些论文虽既不新颖也不深刻,但的确揭示了鲁迅的一些态度,这些塑造他一生的态度在当时业已形成。首先,他展现出对普通人的同情,以及将他们的福利交给少数卓越

人物的意愿。他是个天生的人道主义者,孩提时期就曾为母亲家乡农村贫弱群体的困境动容。就其理想而言,他认为没人应该受苦,人人都应该过充实的一生。在实践中,他似乎认识到实现最好的愿景需要一些引导。其次,鲁迅强调生活和文化的复杂性,以及精神与物质共同发展的必要性。发展依靠哲学和科学,因此二者都不容忽视。这些态度后来影响了他对共产党人的看法:一方面让他从不轻易或机械地接受其理论,另一方面让他容易接受共产党为实现“共同利益”必须采取的手段,尽管这些手段可能损害人道主义价值观。因此,对他来说不存在目的和手段的问题。<sup>⑥</sup>

密含芮的论文对鲁迅早期思想研究最大的贡献,是将鲁迅和梁启超的思想还原到历史语境之下进行对比。当然,论文内容可能存在细微瑕疵——摩罗实际是佛教故事中的骗术之神(a divine trickster),但鲁迅将其“软”处理,成了罗伯特·骚塞斥责拜伦为“恶魔派首领”中的“恶魔”。<sup>⑦</sup>在这篇论文的语境中,与其说摩罗是破坏者,不如说他是为挽救人道而呼吁抵抗的人。至于鲁迅对社会主义思潮的遗漏,共产主义史学家可能对此更感兴趣,实际社会主义思潮与论文语境及鲁迅的论点关系不大。她的结论“对他来说不存在目的和手段的问题”略显轻率。

1968年,安吉拉·卡斯特罗(Angela Shek-hing Castro)在伦敦大学完成其长篇硕士论文《鲁迅早期论文四篇》(Four Early Essays of Lu Hsün)。论文的指导教师是周作人(1885-1967)研究专家、后来的鲁迅传记作者卜立德(D. E. Pollard)。作者将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吸引看作“对中国思想的征服和改变”。她选择讨论关于科学的《人之历史》和《科学史教篇》,以及关于人的《文化偏至论》(她译为 On the Perver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和《摩罗诗力说》。卡斯特罗总结自己的观点:



鲁迅认为西方科学对人体健康有助益。但他更担忧,中国国民应以正当的视角面对西方文明这一整体,方能从中受益。因此,他公开反对当时两种极端且对立的倾向,即对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彻底痴迷,和对中国文明优越性自负的幻想。他主张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中国和西方文明,但也提倡以理想主义取代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取代民主主义,认为这才是中国复兴的当务之急。他援引海克尔、施蒂纳、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易卜生、拜伦、雪莱、斯拉夫浪漫主义者如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以及裴多菲,作为真正的主观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在鲁迅眼中,文学是向人类灌输伟大思想和高尚情感,以此将其从生活琐事和陈腐习俗中解脱出来的最佳手段。他对这一观点保持乐观和自信,因为他笃信进化论,认为人类进步是必然的。后来,鲁迅修正甚至摒弃了一些观点,但总体来说,他从未背离最基础的信仰。这些论文文体与其后期文章迥然不同,处处体现古风,整体艰涩难读。尽管如此,相比后期作品,这些论文内容更丰富,更有古典美。<sup>⑥</sup>

笔者看来,鲁迅并非举拜伦和雪莱为主观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施蒂纳、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才是。有些学者认可的鲁迅反对“民主”这一说法,实际上过分简化了。鲁迅反对的是以“众数”之名践踏人权、压迫天赋的做法。这并不是说此文问题很大:卡斯特罗在前三分之一(1-122页)总结和分析了每篇论文,尽管依靠文本细读,而非美国学者舒威霖和密舍芮推崇的历史语境重构,仍逻辑缜密令人信服。论文的中间部分(123-289页)包含翻译,偶尔出现连贯性、准确性的问题,但英文大体是正确的。

下一位对鲁迅早期论文研究成果较多的学者是威廉·莱尔(William A. Lyell)。1971

年,莱尔取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鲁迅的短篇小说舞台》(*The Short Story Theatre of Lu Hsün*);此文后经修改成书,以《鲁迅的现实观》(*Lu Hsün's Vision of Reality*,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为题出版。莱尔表示三篇早期论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尤为有趣,阐明了鲁迅的文学观”。<sup>⑦</sup>针对单独挑选的这三篇论文,他评论道:“《文化偏至论》清晰展现了鲁迅思想的特点之一,即怀疑信奉多种主张的人的动机;这一特点支配了他成熟时期的小说、散文创作。”<sup>⑧</sup>随后莱尔引述日本学者今村与志雄 Imamura Yoshio(1925-2007)的观点,后者指出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尖刻而讽刺地批评了当代思想主流——启蒙运动的根本内涵,指出启蒙运动已被口号化,成了倡导富国强兵、提高生产力、培育工业、甚至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运动”。<sup>⑨</sup>莱尔继续写道:

鲁迅认为十九世纪欧洲思想的主导趋势,即物质主义和社会民主,是对天主教廷唯灵论以及国家独裁主义过度反应的结果。这种极端的过度反应导致原始物质主义的产生,使人们对智性生活失去信念;此外还衍生出一种虚假民主,以众数的名义欺凌个体。鲁迅列举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和易卜生,指出他们都抵制十九世纪的均衡发展对个人主义的限制。十九世纪的欧洲文明从改革中诞生,最初基于抵制改革前的陈腐道路的思想;这种文明因其对物质主义和社会民主毫无批判的偏向,已走向极端。鲁迅指出,新理想主义者(指尼采等人)最先开始发声,主张纠正这种极端。<sup>⑩</sup>

鲁迅反对的不是“唯灵论”,而是组织宗教的滥用。他告诫警惕极端,认为主张全盘西化是错误的。中国“应该有选择性地接受西方新文化的影响,但是认为一种文化可以

突然取代另一种文化的想法,毫无根据”<sup>⑬</sup>。鲁迅关于文化发展的推论似乎是黑格尔式的。莱尔指出:

他认为中国不应被欧洲文化的“偏至”发展误导,这一点很重要。中国应该朝着欧洲未来的方向前进,应该会脱离十九世纪狭隘的物质主义和社会民主思想,朝新理想主义者勾勒的个人主义和精神主义发展。因此,中国现在应该尊重个人,扩大知识、精神领域。一旦中国人作为个体变得独立而强大,其他方面也会随之发展;其他岔路都会自行消亡。由此,我们看到了鲁迅的思想框架,他多数成熟时期的文学作品都在此框架中产生;个人精神(心理)解放是中国人集体能力解放的先决条件,也是最终建立强大而有活力的新社会的先决条件。鲁迅在其后期的短篇小说中会描述禁锢中国精神的枷锁,期望卓越人物能找到突破的方法。在论文结尾处,他指出中国和欧洲的真正力量都在于其人民,这一精神因素并不像他们的劳动果实(重型机械、火车、船舶等)那样显而易见;因此,中国要实现国内安宁,同时增强实力以御外侮,必须首先“立人”。因为人民一旦能“立”,其他方面都会随之发展。<sup>⑭</sup>

莱尔没有讨论鲁迅“立人”思想的来源,也没有像郅元宝或舒威霖那样,分别认为其根源在中国本土<sup>⑮</sup>,或源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关于鲁迅对旧中国的批判态度,莱尔似乎过于敏感,因此也同舒威霖一样,没有详加讨论。实际上,莱尔将鲁迅的原文“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翻译并调整成“中国和欧洲的真正力量都在于其人民”。<sup>⑯</sup>舒威霖的译文则更贴近原文。我认为莱尔也受到了他那个时代背景的影响,在1971年(左右)写作时,他倾向于柔化

对中国的批判,并使用“爱”等主观词汇来描述鲁迅对人民的态度,这在西方学术书写中并不常见。实际上,他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为中国人民的生存提供了独特的心理策略,这一点很有问题。<sup>⑰</sup>

莱尔对《摩罗诗力说》的解读与舒威霖有所不同。他认为鲁迅“主要对主张反抗,不符合主流(‘non-conformity’即1960年代末西方用语)的恶魔精神感兴趣,并举拜伦(他推崇苏曼殊[1884-1918]的译本)和雪莱为典型范例。他将‘摩罗’解释为恶魔,注明其最初用于描述拜伦;但他主张将此称号用于所有为反抗天人振臂高呼的诗人。这些诗人旨在唤醒同代人,共同寻找更有意义、更自由、更强健的生活方式”。<sup>⑱</sup>同页脚注中,莱尔引前苏联学者谢曼诺夫的话(由查尔斯·阿尔伯英译):“论文的主要目的”是“宣告作者,一个反抗者,对社会发起的挑战。”<sup>⑲</sup>因此摩罗诗人是反抗者,但也是复兴者。莱尔告诉读者:

所有的“摩罗诗人”都以某种方式与武器和流血相关联,因为他们是勇士——不是一般的战士,而是精神的勇士。鲁迅指出,中国需要这样的勇士。这些“精神的勇士”让文化发声。沉默的文化往往趋近灭亡。勇士的作品能形成“心声”,表达全国人民内心的感受、希望和恐惧。这种“心声”也是预言性的,或劝诫文化改革,或唤醒人民反抗压迫。<sup>⑳</sup>

但莱尔倾向将鲁迅同尼古拉·果戈理(1809-1852)而非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进行类比。他写到鲁迅对果戈理格外留心,“因为他是打破俄国几个世纪的沉默的声音。他向俄国乃至世界展露遭受苦难的人民悲情面孔上无形的泪痕。他让十九世纪的俄国人看到生活的阴暗面。鲁迅终生钦佩果戈理,也会像果戈理在十九世纪的俄国那

莱尔作此评论,也许因为与思想家相比,他更重视鲁迅文学家的身份。果戈理和高尔基是迥然不同的作家,前者有阴暗的一面,也有幽默的一面,因此与鲁迅更相像。值得注意的是,莱尔将“心声”译为“思想的声音(voices of the mind)”而非“心的声音(voices of the heart)”,赋予这个词理性的一面。“心声”一词可能源于对雪莱的描述,但莱尔和舒威霖均未提及这一点。

关于这个词,北冈正子谈到滨田佳澄的著作《雪莱》(シェレー)的第三章《诗人雪莱》<sup>②</sup>:

滨田在这一章里指出,雪莱理想的、革命的精神根源在于“有余之赤心”(赤心即人最深处,最真实的心和最忠诚的想法,即诚挚的心)<sup>③</sup>,并把这个“赤心”所发的声音称为预言者的声音,而这个预言者的声音即“人之声”(举出领导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的思想家们作为“人”的例子)。由这个“赤心”所发出的“人之声”,同鲁迅以其有无看民族之生死的所谓“心声”,岂不是同样的东西吗?<sup>④</sup>

至于“德国心声”莱尔指出,鲁迅选择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 1769-1860)和卡尔·西尔多·康纳(Karl Theodor Körner, 1791-1813)为代表人物:“他们的声音激励德国人民,在拿破仑入侵、国家将亡之时,进行英勇抵抗。鲁迅强调这些范例,旨在告诉中国读者,国之生存不能仅凭武器和科技。”<sup>⑤</sup>其实,鲁迅还写下了更为激烈的民主主义、国际主义文字:“败拿破仑者,不为国家,不为皇帝,不为兵刃,国民而已。”<sup>⑥</sup>莱尔并未就这一点进行深入讨论,转而讨论鲁迅对抹煞文学现实价值的评论家的回应。他总结道:

然而,也许文学最重要的功能,是展

不能的方式向读者展示生活(中略)……他学科可以极尽详细地描述人类生活却无法将生活放入读者的手中。文学能让读者体验真的生活。<sup>⑦</sup>

莱尔转而讨论《破恶声论》,他首先将标题的英译“On Breaking Through the Voices of Evil”归于前苏联汉学家弗拉季斯拉夫·索罗金的协助。莱尔认为鲁迅在这篇论文中继续“寻找精神勇士,他们能吹起号角,唤醒沉睡的同胞追求更新、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在这篇论文中,鲁迅也严肃质疑了那些寻求各种方式挽救中国的人的动机”。<sup>⑧</sup>莱尔继续讲到,然而“《破恶声论》的主题不在于此,而在另一方向,体现了鲁迅和梁启超在小说的社会任务方面的巨大分歧”<sup>⑨</sup>。他引述今村与志雄的观点来总结这一讨论:

反迷信运动作为梁启超倡导的改革的一部分,当时发展势头正好。以反迷信为主题的政治小说大量面世。这些专注于反迷信运动的学者(1)视宗教为幻觉,(2)禁止宗教集会,并(3)蔑视神话。与此相对,鲁迅……进行了驳斥。<sup>⑩</sup>

莱尔认为,鲁迅“对专注于反迷信运动的‘志士’的驳斥,与其对绅士和农民阶级的看法密切相关……绅士阶级不愿为当代中国的困境承担任何责任,反而将国之弊病归咎于农民”<sup>⑪</sup>。他指出,鲁迅认为民间神话中龙的形象反映的是中国人民的想象力,而非如某些绅士所认为的,反映人民对科学的无知。他总结道:

鲁迅的伟大之处,也在于他对中、西文化一贯独到的见解。这种见解在几十年间来来去去的思想、政治潮流中形成。1908年,卡尔·马克思的作品在中国还读者寥寥(据我所知,很久之后鲁迅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鲁迅就已开始进行类似社会阶级分析的研究了。因此

五四时期,他对“德先生”和“赛先生”不甚热心,也就不足为奇了(中略)他的笔锋也触及学生群体。他认为在中国,有一种相当鲁莽的运动正肆意占领佛教建筑,将其变成学校。将寺庙改建为学校——听起来并不合适,佛教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之一,其价值毋庸置疑;学校教出的学生,充其量算是较低层次。这些学生却洋洋得意,认为自己是现代中国宝贵的礼物。<sup>②</sup>

莱尔认为,在中国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鲁迅就表现出了阶级意识的萌芽。他也察觉到鲁迅对宗教的尊重(莱尔本人是罗马天主教徒,对犹太教也非常尊重),对某些旧东西的敬畏,以及对“德先生”和“赛先生”本能的怀疑。这些特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知识分子身上也都有所显现(梁启超在1920年代也对此做出过评论)。因此莱尔看来,鲁迅是那一代人中的先觉者(笔者赞同这一观点)。他继续写道:

在这篇论文中,鲁迅第一次使用批判的眼光看待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的应用。他指出在西方,该学说的堂皇词藻往往被用于为压制弱势群体的事实辩护。(伪善的行为若在中国存在,在西方也存在。)他也提醒读者,有些主张反抗西方压迫者的中国人,也已做好准备在这方面步其后尘了。<sup>③</sup>

莱尔总结:

从这三篇论文中,读者能体会到作者的批判性洞察力。鲁迅对中、西方的看法是理性的,源于成熟的思考、大量的研究和爱;是他通过勤恳工作取得的独到成果。<sup>④</sup>

这一结论肯定了鲁迅批判视角的独特性和价值,笔者也赞同。但如上文所言,莱尔没有解释“爱”是如何作用于其中的。随后他

转向下一主题,译者鲁迅:

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看到中国的优势和弱势都出于同一原因——闭关锁国(中略)中国从未受过真正的外部刺激,导致其发展渐趋停滞。因此,可以说鲁迅眼中译者的功能与作家同等重要。在鲁迅看来,译者如同打破国家沉默状态的摩罗诗人,其作用与作家同等重要(中略)他个人生活的两大敌人——无声和寂寞——也是中国的敌人。摩罗诗人可以杀死第一只敌兽,译者可以对付第二只。<sup>⑤</sup>

在书的结尾,莱尔讨论了鲁迅对待自己短篇小说写作的严肃态度,引冯雪峰文章(1937年)中鲁迅曾对冯说的话:“就是我的小说,也是论文;我不过采用了短篇小说的体裁罢了。”<sup>⑥</sup>莱尔补充道:

鲁迅是中国文化古典思想(若非四书、五经)的评论家,且是个非常严苛、激进的评论家。身处社会转型时期,鲁迅不能用评论或评注的方式进行自我表达,转而通过创作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来达成目的。他不仅是个讲故事的人,还是个通过小说等创作进行自我表达的文化哲学家。<sup>⑦</sup>

也就是说,莱尔眼中的鲁迅既是一名文学家,也是一名思想家。创作和翻译都是其“文化哲学家”身份的一部分:

鲁迅既没有退回到既成的过去,也没有幻想未来、逃避现实,他接受自己在时代中的位置。这种对其时代“现时性”的接受,为他的作品和思想增添了精神的重量。他为默默受苦的中国人民发声,置身于自己青年留日时期就钦佩的摩罗诗人行列之中。<sup>⑧</sup>

莱尔从以上角度研究了三篇早期论文,以此不仅树立了鲁迅世界性批评家、思想家、

对中国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先行者的形象,同时还指出鲁迅是宗教和想象的捍卫者,是一名深刻的知识分子,对科学、民主(我倾向翻译为 majority rule“众数统治”)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持有理性的怀疑态度。他指出了摩罗诗人在鲁迅思想主张中的中心地位,实际也将鲁迅置于摩罗诗人的行列之中。

莱尔的书出版之后,美国的鲁迅研究专著出版出现了空白阶段。中国学者开始在早期论文研究上有所斩获,王士菁首先出版了白话文译本《鲁迅早期五篇论文注译》(1978年)。紧随其后,克里斯丁·法伊尔(Christine Pfeil)1984年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系完成长篇硕士论文《鲁迅:1907年的论文》(*Lu Hsün: the 1907 Essays*),指导教师是K. C. 刘和唐纳德·普赖斯(Donald Price)。文章考察了鲁迅早期论文中几种核心概念,但对语言及其历史语境关注不多。

李欧梵(Leo Ou-fan Lee)使用埃里克森(Eriksonian)心理模型对鲁迅的童年和性格形成期进行的传记学研究,令他在鲁迅研究界初露锋芒。该研究最初在1970年以中文发表于《明报月刊》,<sup>⑨</sup>后经修改,以《一位作家的产生》为题,成为其著作《铁屋中的呐喊》里的一章。<sup>⑩</sup>在他编的论文集《鲁迅及其遗产》中,李欧梵讲到鲁迅早期论文:

“鲁迅笔法”植根于传统中国文学。王瑶认为,鲁迅继承的具体遗产是魏晋(220-420)及更早期的古文;与繁复雕琢的骈文相比,也可称为散文。散文常用于说理或议论,鲁迅爱其“清俊”、“通脱”,但经章太炎过滤后,与晚清盛行的两种散文风格(桐城派和文选派)鲜明对立。章认为后两者不够朴拙严峻。

鲁迅对严复(1854-1921)和林纾(1852-1924)桐城派风格的抵触,以及对章太炎古文风格的认同,也是其文化重新定位的重要一步。魏晋古文本身就

是对汉代和先汉风格的精炼,其说理、议论的功用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简洁的言辞结构赋予其丰厚的知识密度。章太炎、鲁迅的典型古文作品艰涩难读,因为隐喻都压缩到一个看似无序的整体当中。这一严密而混乱、简明而虚夸的组合看似矛盾,其实是章太炎对当时的流行学派在文体风格上的回击。思想上、文体上与章太炎最截然不同的康有为学派,其弟子梁启超在当时继续发挥巨大的影响。康梁学派秉持“今文”的传统,且强调单一视角的展开。

吸引鲁迅的,也许是章太炎非正统的传统主义中潜藏的激进主义——即对既成的文学思想体系、文体体系的极度怀疑。在文章通俗化的潮流中,章太炎对纯正古典文体的认同,可能也激发了鲁迅对宋代以前文学和思想的古典偏好。鲁迅杂文看似漫无目的,其实可能是章太炎古文表达方式的现代体现;其中大量的文言语句和典故,有些甚至生僻难懂,也可归因于章太炎的影响。

然而,不能就此过分强调古文对鲁迅杂文的影响。因鲁迅在杂文创作中也经常模仿其他文体,甚至包括僵化的八股文,作为讽刺手段。最终的关键在于,研究鲁迅身处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古体散文风格传统中,是怎样超越其限制,逐步发展自己的独特风格的。翻开他最早的白话随笔——1918年的《随感录》,我们会被其中糅杂的多种元素而触动。<sup>⑪</sup>

李欧梵这段议论的价值,在于对鲁迅早期论文的文体和语言的考察。然而,我并不认为鲁迅1907-1908年间的论文“漫无目的”。《摩罗诗力说》结构清楚、目的明确。其他各篇虽文脉展开但也前后连贯。这些文章也没有过分用典,甚至恰恰相反。伊藤虎丸(Ito Toramaru)(1927-2003)在其《破恶声论》日译本附录中提到,鲁迅频繁引《庄子》中的

字词,仅将其作为字词使用,很少与《庄子》原文本相关联。<sup>⑭</sup>李欧梵本可以将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的研究再进一步,如研究1907年《河南》杂志上刊登的《摩罗诗力说》原版中鲁迅坚持使用“怪句子和古字”,一方面为保持汉文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如笔者在从前的文章中讲到的,是为使论文听起来或者说“看”起来更像纯正的满族、蒙古族、匈奴统治前的“汉文”。<sup>⑮</sup>1927年在《坟》中重新出版早期论文时,鲁迅将一些生僻字改成了现代字体,但也留下几个未经改动,或许有其深意。

接下来是胡志德(Theodore Hutters)的著作《把世界带回家:晚清和民初中国的西学中用》(*Bringing the World Home: 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的最后一章。章节名称为《鲁迅与赋形危机》<sup>⑯</sup>。胡志德将《科学史教篇》纳入讨论,开篇便称早期论文为“非常杰出的一系列四篇”<sup>⑰</sup>,但也说它们“语气过分悲观”<sup>⑱</sup>。笔者曾讲到,忧思其实是严肃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一时期的自然反应,<sup>⑲</sup>敏感的青年鲁迅更是如此(这种敏感激发了他的“主体性”)。胡志德总结《摩罗诗力说》,指出“尽管鲁迅在论文中宣扬英雄主义文学的力量,总结时却忧叹至少在屈原(公元前343—公元前278)去世后两千年间,中国从未出现此类文学”<sup>⑳</sup>。他随后探讨《文化偏至论》,写道:“汪晖对这篇论文的看法毋庸置疑是正确的,他认为‘鲁迅对社会的历史性批判,只以主体性结构为基础;个人主体性觉醒是鲁迅规划的国家、社会解放蓝图的基石’”。<sup>㉑</sup>

汪晖与胡志德之间的学术往来早就开始且仍在继续。胡志德将汪晖的两部论文集编辑并译成英文<sup>㉒</sup>,也(与宗阳阳)翻译了汪晖的论文《声之善恶:什么是启蒙?——重读鲁迅的〈破恶声论〉》。<sup>㉓</sup>胡志德认为:

尽管鲁迅在这篇论文中使用了多种

修辞,许多明显的矛盾仍从看似乎缓的话语表面凸显出来。最显而易见的即鲁迅在总结中指出,如果他倡导的改革态度得以采用,“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sup>㉔</sup>。能让全体国民突然都获得了之前鲁迅眼中少数卓越人物独有的“自觉”,这能力源自何处?汪晖提出的两种不同的个人主义——人人平等相待和强调特定的人的权利——之间是有差别的。然而鲁迅在文末似乎将这两种个人主义合并,明显将尼采哲学中卓越个体独有的权利泛化为想象中全体国民共享的权利。但也许到最后,鲁迅无法允许自己将前文详述的自由主体性限制到特定的“超人”群体。<sup>㉕</sup>

换言之,尽管鲁迅怀疑大众会被轻易误导、践踏人权,但他仍希望少数专注的作家能够启蒙民智,使中国从一盘散沙转变为一国真的人。笔者认为这并不矛盾。鲁迅使用这种文体也并不旨在粉饰话语表象的太平:论文的文体与其语言、思想一样,都构成一种挑战。胡志德指出:

在对西方权威声音的持续依赖之下,这些本应不仅陈述有力观点,而且呼吁果敢行动的文字,显得有些讽刺、有距离感。鲁迅早期论文旨在肯定主体声音的力量,但它们自身却从未体现为作者主体意识的产物,这一点是否含有一定程度的反讽性?换言之,五四时期鲁迅许多文章的突出特点是对观点的强烈表达,但早期论文在这方面显得相当克制、有怀疑精神。或许,由此可见,他对于将其他历史传统的声音挪为己用的做法,显得十分担忧(中略)他的确相信这些声音能反映时代的需求,但也似乎决心与它们保持距离(中略)因此,鲁迅与欧洲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同时可能也在

警惕主体性带来新极权主义的怪圈,认为其潜在危险性与他正公开抵制的思想不相上下。<sup>⑭</sup>

在笔者看来,鲁迅只是试图避开那些“体现为作者(鲁迅)主体意识的产物”的陈述,使论文听起来更加客观。他整理、总结、重排、引述西方权威,是为了支撑自己的议论。因此,这些早期文章属于论文,而非散文或读后感。他想通过使用这种表达及保持“距离”,让读者相信他的客观性。胡志德提醒读者:“一种观点有力地贯穿了鲁迅论文,即晚清物质改革的倡导者对其主张吸收的思想过分沉迷。”<sup>⑮</sup>鲁迅也有思想主张,但他从不过分沉迷。胡志德指出:“酒井直树(Naoki Sakai)将竹内好对鲁迅的基本理解总结为:‘反抗必须被比作一种消极性,但又不是——种否定。这种消极性持续扰乱一种所谓的静止状态,由此主体才能实现自我发展。’”<sup>⑯</sup>

关于胡志德对《文化偏至论》中“我”的缺失的看法,邓腾克(Kirk Denton)指出:

胡志德认为鲁迅1908年的论文《文化偏至论》中主体表达的缺失是他有意为之,目的在于将论文中显现的主体意识模糊化,这种说法我不赞同。简单来看,这首先是论文写作的工具——抑制主体表达的文言文造成的;其次,这也是为了顺应“半殖民”时期寻找西方殖民宗主<sup>⑰</sup>权威声音的需要。胡志德这样解构早期鲁迅,似乎旨在塑造他对主体性的一贯怀疑态度,并说明这种态度贯穿从晚清到五四的鲁迅作品。但我倾向认为,鲁迅晚清时期的作品从根本来讲在极端的主体性和坚决的科学主义之间左右摇摆。<sup>⑱</sup>

笔者在自己翻译并注释的四篇论文当中没有发现“坚决的科学主义”。<sup>⑲</sup>《人之历史》和《科学史教篇》中可能存在,但这些毕竟是宣扬科学的文章。而我认为,早期论

文重视科学精神(按:原文为斜体),所以也就是对主体性的认可。

这一点王德威讲得比较透彻。2015年6月20日,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国际学会(ACCL)双年会在复旦大学召开。王德威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讨论如何使用文论这一概念来描述传统中国文学理论与现代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打破西方文学理论在全球的话语霸权的必要性。他提出,有必要在鲁迅早期论文等作品的基础上发展中国文论,并举早期论文对心(心、思想、精神)的观照为例:《文化偏至论》中对“新神思宗”的推崇、《摩罗诗力说》中诗人是“撷人心者”的说法、以及《野草》《墓碣文》中描绘的恐怖画面:尸体撕开胸膛抉出自己的心脏,品尝味道;继而比较鲁迅与弗洛伊德对“心”的观照的异同。<sup>⑳</sup>从王德威对鲁迅早期论文思想的极大兴趣中,足可以看出他发现这些思想对建立新的中国诗学颇有助益。

回到日本学界,北冈正子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原名:「摩羅詩力說」材源考ノ一ト)首次开始连续出版在1972年。该书包含18篇日文文章,考察鲁迅1907年关于中西文化的长篇文言论文《摩罗诗力说》的材料来源。北冈正子毕业于东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研究所,后成为关西大学文学系教授。作为赵京华眼中日本鲁迅研究的“实证派”<sup>㉑</sup>的主要成员,她撰写了这一系列极有价值的文章,最初发表于日本中国文学方面的学报《野草》<sup>㉒</sup>的第9-30期(1972年10月-1982年8月)。这些北冈自谦为“笔记”的文章后被何乃英教授选译成中文并以单行本形式出版。<sup>㉓</sup>何乃英教授译文质量极佳,但没翻译日文文章的全部,也省略了原文中大段日文及西方语言的引文,只保留了对应的中文翻译。后来北冈把它修改成相当于之前“笔记”的精简版本,作为《鲁迅全集》日译本第一卷中《摩罗诗力说》的译者尾注(1985年),但其中仍不包含西方语言的引文。

最近(2015年),北冈出版了同一课题的专著,与之前的“笔记”相比内容更新、改动较大。<sup>⑭</sup>北冈新作包含大量西方语言和明治时期日语的引文,提升了研究价值;还包括八页书目提要 and 九页人名、作品名、术语和事件名索引,非常有用。北冈首先考察了鲁迅和周作人为创作《摩罗诗力说》而进行的研究<sup>⑮</sup>过程:

根据厄内斯特·贝克(Ernest A. Baker)的《最佳英美小说指南》(A Descriptive Guide to the Best Fiction British and American)、古斯塔夫·卡佩勒斯(Gustav Karpeles)的《文学史概览》(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von ihren Anfängen auf die Gegenwart)、谢尔·约翰内斯(Scherr Johannes)的《世界文学史》(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等英、德文学历史作品中的书目提要,(周氏兄弟)在神田和本乡的书店中搜寻所需的材料。此外,有了详细的书名信息,他们就在丸善及其他书店下订单购书、取书。他们也通读杂志刊登的介绍文章和翻译作品,从中摘取所需的资料。周氏兄弟收集的多为格新(Gesshin)和列克拉姆(Reclam)出版社的书系,其内容丰富,价格低廉,可以说非常适合囊中羞涩的学生。两兄弟执着地寻找波兰、保加利亚、波斯尼亚、芬兰、匈牙利、现代希腊、丹麦、俄罗斯、捷克、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挪威、瑞典、荷兰等“边缘”国家的作品。据周作人回忆,这些国家的作品英译本极少,几乎都是德译本。因为书店里英译本寥寥,搜集难度很大。俄文和法文小说尚能搜集到手,东欧和北欧的作品则很难找到。他们将部分作品翻译并编入《域外小说集》。此外,周作人说鲁迅这一时期的思想可以被归为宽泛的民族主义范畴。他主要译介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对

俄国文学的首要考量因素,就是反抗压迫。<sup>⑯</sup>

鲁迅使用的材料来源广泛,但主要从以下几本中衍生出来:丹麦评论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关于俄国、波兰文学的几部作品、约翰·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的《雪莱》、以及关于拜伦和雪莱的日文作品。后者包括木村鹰太郎(1870-1931)的《拜伦——文艺界之大魔王》(文界之大魔王:バイロン,东京:大学馆1902年版)<sup>⑰</sup>、木村鹰太郎翻译的拜伦诗《海盗》、米田实(1878-1948)用古日语写的传记《拜伦》(バイロン,东京:民友社1900年版)、以及滨田佳澄的《雪莱》(シェレー,东京:民友社1900年版)。《雪莱》体现了日本西方文学研究界的先锋学者以书的形式对雪莱表达的同情关怀,也是鲁迅《摩罗诗力说》第六部分中关于雪莱的主要资料来源。周氏兄弟还用到了以下作品:埃米尔·赖希(Emil Reich)的《匈牙利文学史》(Hungarian Literature,伦敦:杰拉德父子出版社1898年版),弗雷德里克·利特尔(Frederick Riedl)著、吉尼弗(C. H. Ginever)译的《匈牙利文学史》(A History of Hungarian Literature,伦敦:威廉海纳曼公司1906年版),格奥尔格·勃兰兑斯的《波兰:土地、人和文学》(Poland: A Study of the Land, People and Literature,伦敦:威廉海纳曼公司1903年版),格奥尔格·勃兰兑斯著、伊士曼(S. C. Eastman)译的《俄国印象记》(Impression of Russia,伦敦:沃尔特·司各特公司1889年版),彼得·克鲁泡特金(Petr Kropotkin)的《俄国文学的理想与现实》(Russian Literature: Ideals and Realities,伦敦:都克沃斯公司1905年版),裴多菲·山陀尔(Petőfi Sándor)著、戈尔德施密特(J. Goledschmidt)译的《裴多菲诗选》(Gedichte von A. Petöfi,莱比锡:列克拉姆公司1883年版),裴多菲·山陀尔(Petőfi Sándor)著、克默迪(J. Kömödy)译的《绞吏之绳》(Der Strick des Henkers,莱比锡:



列克拉姆公司,年代不详)等等。北冈还指出,鲁迅主要研究单行本,而非期刊文章,<sup>⑳</sup>可能是因为他的材料多购于售卖单行本为主的旧书店。此外,显然鲁迅和周作人在这一项目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和财力,以完成研究和写作。

北冈正子一直强调,鲁迅作《摩罗诗力说》时有自己的目的:

此处我想指出,鲁迅在追溯“恶魔派诗人”这条源于英国拜伦的线索时,没有考察西欧各国,而是在中、东欧等地区进行搜寻。同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关于受尽落后和压迫之苦的人民对民族独立的渴望的问题。<sup>㉑</sup>

一些中国学者匆促得出结论,认为北冈的研究旨在论证鲁迅早期论文为抄袭之作。李震在一篇原本很有启发性的文章中直接写道:

……【还有人】将《摩罗诗力说》当做一部翻译,甚至剽窃之作。此见出自日本学者北冈正子。她认为《摩罗诗力说》是鲁迅在日本期间转译别人的文字,全文的九个部分中,从第四部分到第九部分的前半部分可以算译文,而前三部分是译序,第九部分的后半部分是译跋。<sup>㉒</sup>

这种误读显然是偏狭的。早在1975年,北冈就在其文章中明确解释了抄袭的问题。她写道:

关于《摩罗诗力说》我想补充一点,对“恶魔派”诗人进行梳理之后,我们现已大体掌握了每个部分的材源。(但《摩罗诗力说》的)中心思想,并不是通过解释材源的应用等方式就能总结出来的。如果用流行的话语解释,就是抄袭的问题也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但

我认为我)以上举出的例子足以澄清这一点。对于鲁迅在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中寻找“恶魔派”的方式以及他构建的内容,我可以果断而明确地强调,这不是“抄袭”。要理解鲁迅写《摩罗诗力说》的真实意图,我认为必须在其结构的基础上进行解读。此外,我们必须分清,鲁迅选取材料并使用它们解释自己的问题这一方式,与依靠他人的观点阐明问题的方式。<sup>㉓</sup>

笔者想借此文呈现海内外学者对鲁迅早期论文的重视情况。一方面,如上文所讲,这是因为我认为早期论文是鲁迅未来事业规划的蓝图;此外,它们也体现了青年鲁迅成长时期所受的影响。可以说,早期论文尽管被认为是鲁迅不成熟阶段的产物,它们仍是理解鲁迅思想发展史的一把钥匙。在1970年代(实际甚至更晚)之前,这些论文在中国遭受冷落,一方面与论文晦涩的语言有关,但更多的在于文中叛逆的思想、争议性的材源(如直到最近[不仅在中国]仍被称为“原始法西斯党徒”的尼采)、以及鲁迅对压迫天才、以众欺寡、甚至借众数为名行压迫之实的人的谴责。在文学和思想方面,早期论文大胆选择了新的方向,即在不预设反传统立场的前提下,对中国文学、文化、政治中的旧东西进行批判;同时,论文倡导知识自由,也不将西方树立为不得不学的榜样。由此,早期论文作出了成熟的尝试,为当时和现在的中国规划了一条道路:坚持国际主义、重视个人、主张反省、提倡理想、批判物质文明。

#### 注 释:

① 见鲁迅:《集外集·序言》:“以后又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第4页。

② 见鲁迅关于章太炎的两篇回忆文章:《鲁迅全集》第6卷,第545-551、556-561页。另

有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题为“*Some Recollections of Zhang Taiyan*”(《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A Few Matters Concerned with Zhang Taiyan*”(《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见英文版《鲁迅选集》*Lu Xun Selected Works*第4卷,杨宪益、戴乃迭译,外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22-326,327-334页。对于二人关系的进一步讨论,参见陈学然:《章太炎与鲁迅的师徒交谊重探——兼论二氏的学思关系》,《台大中文学报》第26期,2007年6月。陈认为鲁迅所钦佩的是章太炎作为晚清反满革命学者的身份,而后两人在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方面因立场分歧而产生隔阂。尽管可能如此,笔者仍认为鲁迅对其1936年描述的章太炎形象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认同。1936年文章中的章太炎可以说是一个陪衬,但同时也是鲁迅的另一个自我。鲁迅在文章中通过追溯青年时代的理想主义总结自己的一生。

③②③ 寇志明、黄乔生:《鲁迅早期论文中的语言学意图:用文言为汉语文学创造“纯正”词汇》,《上海鲁迅研究》2006年第2期,第215-227页。此文指出,鲁迅使用清代骈文之前的“古文”文体,在风格上接近古典文学,以与其文化权威性产生共鸣。

④ 此文1907年在《河南》杂志发表时,标题为《人间之历史》。1926年鲁迅将其编入杂文集《坟》时,改原标题为《人之历史》。

⑤ 《河南》杂志使用“号”或“期”进行编号。此处笔者遵循杂志原版的编号方式。重印版(北京鲁迅博物馆编:《河南》9卷(影印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与之不同,一律在新设计的封面上使用“期”,但在内部保留原版的编号方式。

⑥⑦ 鲁迅:《坟·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5、3页。

⑧ 尽管《题记》标明的写作日期为1926年10月30日,文集在1927年3月才通过鲁迅在未名社的文学关系于北京首次出版,庄爱玲(Eileen J. Cheng)在其英文专著《文学的遗体:死亡、创伤和鲁迅对哀悼的拒绝》*Literary Remains: Death, Trauma, and Lu Xun's Refusal to Mour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中指出,鲁迅当时最重视的是对受难者的纪念。这也证实了笔者对于《坟》题目隐含意义的猜测。

⑨ 洪桥,原名洪增寿,别号三石村人,1920年12月生于安徽庐江。曾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后从事学生民主运动和抗日宣传。早年与胡风相识,写过评论徐迟、鲁迅的文章。1950年代,洪桥被打成“胡风集团”成员,1980年代平反。著有《鲁迅作品研究》《重新认识陶行知》等文史、诗词、心理著作多本。为中国国学研究会会员。

⑩ 该书由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于1976年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匿名出版,书名为《鲁迅文言论文试译》,包含六篇鲁迅早期文章。附录(第260-285页)中包含鲁迅、许广平(1898-1968)、唐弢(1913-1992)、李霁野(1904-1997)、王冶秋(1909-1987)、李何林(1904-1988)、孙用(1902-1983)等学者对早期论文的评论,另有两页参考文献(第286-287页),列出1946年-1970年代关于早期论文的期刊文章。末页(第288页)的后记不但没有对早期论文的内容进行辩解,还指出这些论文“表现了鲁迅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斗争精神”。

⑪ 见王士菁:《鲁迅早期五篇论文注释》(重印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在译者后记(第248-267页)中,王士菁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评价了早期论文的意义。该后记初作于1977年6月,1980年8月略经修改。值得注意的是,一直以来争议较大的《破恶声论》(1908)没有被收录到此书当中。南京师范学院的内部书却收了。

⑫ 见赵瑞蕻:《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修订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下同)。

⑬ 赵瑞蕻:《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第256页。笔者将赵瑞蕻一篇较长的会议论文进行编译,以“*Lu Xun's Mara and the Adv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y in China*”为题发表于Cowrie: a Chines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1984):35-46。

⑭ 见笔者文章“*Lu Xun and Terrorism: a Study of Revenge and Violence in Mara and Beyond*”. In

Peter Zarrow, ed., *Creating Chinese Modernity: Knowledge and Everyday Life, 1900 - 1949*, 83 - 97. New York: Peter Lang, 2006.

- ⑮ 见[日]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陈秋帆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书中文章原本作为系列作品,连载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杂志《野草》第9-30期(1972年10月-1982年10月)。北冈于1982年中断了这项研究,后来重新启动,并于2015年就此课题出版了新的专著(见后文)。
- ⑯ 见[日]北冈正子:《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李冬木译,三联书店2015年版。此书研究鲁迅日本留学的下半阶段。第一章探讨德语学习对鲁迅文学运动主张的作用;第二章讨论鲁迅“诗歌救国”的思想以及摩罗诗派的形成;第三章研究《摩罗诗力说》中人的形象和意义;第四章讨论作为疯子的诗人,以及《狂人日记》中的“自我”;附录中指出严复的《天演论》是理解鲁迅人的概念的前提;从《希望》的意义探讨鲁迅和裴多菲;介绍匈牙利汉学者高恩德(Galla Endre)的文章《裴多菲在中国》(1967年)、关于所谓“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在现代中国文学当中的接受1918-1937年(1972年)等。
- ⑰ 见周正章:《〈摩罗诗力说〉洪桥今译本·序》,《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8期,第80-83页。笔者尚未见到此书。
- ⑱ 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第23-37页。本文由寇志明英译,载于boundary 2: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38, no. 2 (summer 2011): 39-62.
- ⑲ 中文版见汪晖:《声之善恶:什么是启蒙?重读鲁迅的〈破恶声论〉》,载《开放时代》第220期,2010年10月。英译本见胡志德(Theodore Hutters)、宗阳阳译,“The Voices of Good and Evil: What Is Enlightenment? Rereading Lu Xun's 'Toward a Refutation of Malevolent Voices'”, boundary 2: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38, no. 2 (summer 2011): 67-123.
- ⑳ 2014年,北京鲁迅博物馆按首版规格,重新出版了《河南》(影印本),全套共9册。作对1907-1908年《河南》杂志的完全复刻,迅当时使用的“怪句子”和“古字”(语《坟·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3页)得以保存。
- ㉑ 王得后:《鲁迅教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238页。
- ㉒ 孙拥军:《鲁迅和〈河南〉杂志的渊源》,《河: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0年第2期,第71页。
- ㉓ 见寇志明英文论文:《鲁迅的早期文言论与今日中国》“Lu Xun's Early Essays at Present - Day China”. *Studia Orientalia Slovaca*, 12, no. 1 (2013): 19-34.
- ㉔ 见寇志明英文专著:《精神界之勇士:鲁迅早期文言论文》*Warriors of the Spirit: Lu Xun's Early wenyan Essays*,即将出版。
- ㉕ [日]竹内好:《鲁迅》,东京:日本评论社194年初版;东京:未来社1961年版;东京:讲谈社文芸文库1994/2006年版。此书收入《竹内好全集》,东京:筑摩书房1980年版。
- ㉖ [日]竹内好:《鲁迅》,第132-133页。中文译文引自竹内好著:《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下同),第113页(译者注)。
- ㉗ [日]竹内好:《鲁迅》,第47页。译文引自[日]竹内好著:《鲁迅》,李心峰译,第39页(译者注)。
- ㉘ 见中岛长文评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的日文文章:《〈摩罗诗力说〉原版第四章: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评论》(蓝本『摩羅詩力の説』第四、五章:北岡正子氏作るところの「摩羅詩力説材源考ノート」によせて),载于《狂飙》第5期,1973年6月。1974年4月,中岛再次在《狂飙》第6期发文,评论北冈对鲁迅《摩罗诗力说》第七部分中提到的俄国诗人的考察。
- ㉙ 见北冈正子日文论文:《〈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四)》(「摩羅詩力説」材源考ノート(その四)),载《野草》第13期,1973年12月,第78页。此论文延续前篇,研究关于雪莱和葛德汶的材源。北冈在文末(从第74页开始)回应了中岛的评论。在第74页引中岛《狂



- ⑥2 同上,第18-19页。此处密含芮补充说明,张之洞“对民权的讨论也大致如此”,引文见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New York: Atheneum, 1970. p. 这一分析在舒威霖的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
- ⑥3 同上,第19页。此处密含芮引1938年版《鲁迅全集》第1卷,第48-49页。1981年版第1卷,第52页。
- ⑥7 英国当时的桂冠诗人罗伯特·骚赛(Robert Southey, 1774-1843)在其长诗《审判的幻景》(*Vision of Judgement*, 一首尊化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为神的诗)序言中指出拜伦的《唐璜》(*Don Juan*)是“恐怖与嘲讽,淫邪与褻渎的荒谬结合”,恨其还未遭禁,还称拜伦为“恶魔派首领,摩洛和彼列(《圣经》中魔鬼的名字)赋予他灵感”。参见诺尔(Roden Berkeley Wriothsley Noel)的英文专著《拜伦勋爵的一生》*Life of Lord Byron*, London: Walter Scott Co., 1890. p. 165.
- ⑥8 卡斯特罗:《鲁迅早期论文四篇》“*Four Early Essays of Lu Hsun*”, M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8. 第5-6页。
- ⑥9⑦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 莱尔:《鲁迅的现实观》*Lu Hsun's Vision of Reality*, 加州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下同), 88, 88, 90, 90, 91, 49, 91, 91, 91-92, 92, 92, 92, 93, 94, 94, 95, 95, 307, 312页。
- ⑦① 同上,第89页。此处引[日]今村与志雄:《鲁迅与传统》鲁迅と伝統, 劲草书房1967年版,第199页。引文为莱尔英译。
- ⑦② 见郅元宝:《鲁迅六讲》。此书包含郅元宝对许多话题的思考,如鲁迅和国民性、文学创作与学术方面研究、语言的应用、从小说到杂文的过渡、现代中国的自我表达等等。从理论视角来看,郅寻找鲁迅思想在传统思想中的来源,指出鲁迅早期论文中的“立人”思想实际源于宋朝新儒学的“立心”,而非受到西方个人对社会的重要性的思想影响。这种说法与鲁迅在早期论文中的主张相悖,但也不一定就是错的。鲁迅认为在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所有主张中,“立人”最为重要,如其所说“根柢在人”。郅从鲁迅的动机入手,也有其道理。也可参见郅元宝:《鲁迅六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下同),第295页。增订本除重印六篇讲稿之外,增加了136页的附录,包含如下内容:竹内好的《鲁迅》论;鲁迅作品的身体言说;读《野草》;早期论文中“科学”“本根”“神思”的意义;鲁迅、黑格尔和胡风;在祥林嫂目光的逼视下;《破恶声论》及其在鲁迅早期文言论文中的地位;《铸剑》五题;关于《伤逝》;和旧诗(《别诸弟三首》《哀范君三章》《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和《亥年残秋偶作》)略说。其中,郅元宝(同意王得后的观点),指出“四篇论文,层层推进,自成一个整体”。见郅元宝:《鲁迅六讲》(增订本),第248页。
- ⑦③ 引自《文化偏至论》的结尾部分。见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卷,第56-57页。
- ⑦④ 林毓生对莱尔《鲁迅的现实观》中这一点进行了批评,林抓住阿Q在故事末尾遭处决这一情节,质疑莱尔认为阿Q的自欺精神帮助中国人民生存这一观点。参见 Lin, Yu-sheng. Review of *Lu Hsun's Vision of Reality*, William A. Lyell, Jr.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8, no. 2 (February 1979): 365-368.
- ⑦⑤ [日]滨田佳澄:《雪莱》(シェレー),东京:民友社1900年版。该书是日本西方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滨田佳澄对雪莱的赞颂之作,也是鲁迅《摩罗诗力说》第六部分关于雪莱的内容的主要来源。
- ⑦⑥ 约翰·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赞扬雪莱“活跃的,合乎逻辑的诚心”(vivid logical sincerity),“他对自由的热爱,对偏狭的痛恨,对自我和他人的放纵,以及活跃的,合乎逻辑的诚心结合在一起,使他成为发表极端观点的堂吉诃德式英雄”。(“His passionate love of liberty, his loathing for intolerance, his impatience of control for self and others, and his vivid logical sincerity combined to make him the Quixotic champion of extreme opinions.”)见西蒙斯英文著作:《雪莱》*Shelley* (1878),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09. p. 39.
- ⑦⑦ 见[日]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第五篇)》(《摩羅詩力說》材源考ノート(その五)),《野草》,第14-15期(1974年4月),

第98页。中文译文引自[日]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陈秋帆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8页。（译者注）

⑩ 引自《摩罗诗力说》第二部分结尾处，见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卷，第70页。

⑪ 见[日]今村与志雄：《鲁迅与传统》，第214页。此处为莱尔的引用。

⑫ 莱尔：《鲁迅的现实观》，第307页。此处莱尔引（冯）雪峰：《过来的时代》，新知书店1948年版，第22页。

⑬ 见李欧梵：《鲁迅内传》，载《明报月刊》60-61、63-64期（1970-1971年）。这是李欧梵对鲁迅心理分析的最早版本，李克曼（Pierre Ryckmans）颇受其影响，称之为“透彻的研究”。参见西蒙·莱斯 Simon Leys（李克曼的笔名）英文专著：《破碎的意象：中国文化与政治随笔》*Broken Images: Essays on Chinese Culture and Politics*, London: Allen and Busby, 1979, p. 29. 寇志明英文论文：“The Lu Xun of Western Sinologists? Pierre Ryckmans, Simon Leys, René Leys, and the ‘Aestheticization’ of Lu Xun.” *Studia Orientalia Slovaca* 13, no. 2 (2014): 279-297. 对该书有评论。

⑭ 见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⑮ 李欧梵编：《鲁迅及其遗产》*Lu Xun and His Leg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5. 第26-27页。

⑯ 伊藤虎丸写道：“《破恶声论》用文言写就……鲁迅使用的古典字词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多引自《庄子》、《淮南子》和《楚辞》，此外，《孟子》、《左传》、《易经》、《诗经》中的字词也常常出现。我认为这与鲁迅此时的文学偏好（比如从他对‘普通人’的感情中显现的文学偏好），不无关系；从鲁迅如何区分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其他）传统，可以看出他眼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其次，我并不认为鲁迅使用这些字词，是在表达对庄子或者道家思想的肯定。”见Rojin（鲁迅）：《鲁迅全集》日文版第10卷，学研社1986年版，第77页。

⑰ 胡志德英文专著：《把世界带回家：晚清和民

初中国的西学中用》*Bringing the World Home: 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第252-278页。胡志德自己称此章写得不好，但我认为他对早期论文的一些观点仍值得考量。

⑱⑲⑳㉑㉒㉓ 胡志德：《把世界带回家：晚清和民初中国的西学中用》，第254、254、255-256、255、258、258页。

㉔ 见笔者英文论文：“*Melancholy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Era Verse*”，收入顾彬（Wolfgang Kubin）编：*Symbols of Anguish: In Search of Melancholy in China*, Peter Lang AG, International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2001. 289-314.

㉕ 胡志德：《把世界带回家：晚清和民初中国的西学中用》，第254页。实际鲁迅在论文中对屈原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然中亦多芳菲凄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卷，第69页。

㉖ 见汪晖、胡志德英文论文集：《亚洲想象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Imagining A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和《中国的新秩序：转型中的社会、政治和经济》（*China's New Order: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rans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㉗ 载于boundary2: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38, no. 2 (summer 2011): 63-123. 笔者的《破恶声论》英译也登载于同期杂志中（第39-62页）。

㉘ 原文“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引自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卷，第56页。

㉙ 酒井直树英文作品：《现代性与其批判》“Modernity and Its Critique: The Problem of Universalism and Particularism.”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87, no. 3 (summer 1988): 第501页。此处是胡志德在《把世界带回家：晚清和民初中国的西学中用》中的引用，第258页。酒井原文即为英文。

㉚ 笔者对这一称谓存疑。勃兰兑斯不是“殖民

宗主”，拜伦、雪莱、莱蒙托夫、裴多菲也都不。周氏兄弟选择研究勃兰兑斯，因他同情革命诗人，且是“既成体系”的局外人。周作人提到：“勃兰兑斯大概是犹太系的丹麦人，所以有点离经叛道，同情那些革命的诗人，但这于我们却是很有用的。”见《知堂回想录》第1卷，听涛社1970年版（下同），第210页。

- ⑪ 见邓腾克对《把世界带回家》的英文书评，载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5, no. 1 (Feb. 2006): 166-168.
- ⑫ 笔者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包含《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和《儼播布美术意见书》。
- ⑬ 此处为笔者引译中文报道。见徐萧：《王德威：文学研究已如死水，亟须打破西方理论的话语霸权》，[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43644](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43644)，引用日期：2016年5月20日。
- ⑭ 赵京华：《周氏兄弟与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0-84页。
- ⑮ 此杂志仍由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主办。
- ⑯ [日]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陈秋帆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 ⑰ [日]北冈正子：《探索鲁迅文学之渊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鲁迅文学の淵源を探索：「摩羅詩力説」材源考），东京：汲古书院2015年版（下同），第xxi页，共650页。
- ⑱ 周作人多年后回忆，鲁迅作《摩罗诗力说》时，自己曾为他口头翻译勃兰兑斯《波兰印象记》英译本中关于密克威支和斯洛伐茨基的部分。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1卷，第78章《翻译小说（下）》，第210页。
- ⑲ [日]北冈正子：《探索鲁迅文学之渊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第ix-x页。
- ⑳ 此处北冈提及其他学者的帮助，例如“首先，中岛长文先生通过与《摩罗诗力说》原文一一对比，确定如下作品为鲁迅使用的（日文）材源：木村鹰太郎《拜伦——文艺界之大魔王》文界之大魔王；パイロン、ハ杉貞利《诗宗普希金》詩宗プーシキン、升曙梦《莱蒙托夫的遗墨》レールモントフの遺墨和《俄国

诗人和诗歌》露國詩人とその詩の第六部分，《莱蒙托夫》。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作为《〈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的一部分，刊登于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主办的《野草》杂志。针对《摩罗诗力说》中的拜伦部分，我指出材源之一是拜伦诗歌《海盗》（The Corsair）的日译本，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其他材源存在问题。中岛长文先生（对我的文章）提出了质疑，在论文《〈摩罗诗力说〉原版第四、五章：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评论》蓝本『摩羅詩力の説』第四、五章：北岡正子氏作るところの「摩羅詩力説材源考ノート」によせて中，他指出鲁迅在拜伦部分使用的材料，是木村鹰太郎翻译的《海盗》以及他的著作《拜伦——文艺界之大魔王》。见[日]北冈正子：《探索鲁迅文学之渊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第xii页。

- ㉑ 一个例外可能是鹿又香琴的《裴多菲：匈牙利文坛奇才》（詩人ペイ テヒク 匈牙利文壇の奇才），载《太阳》第12卷第11期（1906年8月1日），第145-162页。
- ㉒ [日]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七）》（关于裴多菲），《野草》第17期（1975年6月），第75页。
- ㉓ 见李震：《〈摩罗诗力说〉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李继凯等编，《言说不尽的鲁迅与五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页。李震引《〈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1983年译本，但未标出页码。北冈的立场是《摩罗诗力说》各部分“使用的材料”已初步掌握，并非说该论文是转译他人的文字。见北冈：《探索鲁迅文学之渊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第xiii-ix页。
- ㉔ [日]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七）》，第75-76页。李震的质疑有情可原，因笔者也未能从何乃英1983年的中译本中找到这段重要看法。

（作者通讯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译者通讯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邮编：102488）



鲁迅研究月刊

# 鲁迅研究月刊

Lu Xun Research Monthly

2017 年第 5 期

(总第 421 期)

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景山	王得后	王世家	王富仁
韦 力	孙玉石	孙 郁	李允经
张恩和	张 杰	陈漱渝	汪 晖
林 非	郑欣淼	周楠本	姜德明
姚锡佩	高远东	钱理群	寇志明
程光炜			

主 编: 黄乔生

副 主 编: 姜异新

责任编辑: 刘天华 王 霞



关于鲁迅早期文言论文的海外学术反应

[澳]寇志明作 侯大千译

《狂人日记》：“礼教吃人”主题的建构过程与反思

杨红军 2

茶杯里的波澜：《风波》重读

朱崇科 3

#### 鲁迅研究

民国时期中学鲁迅作品教学与学生接受

温立三 4

浪漫感伤的文风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歧途

——论台湾作家龙瑛宗对鲁迅的接受

徐纪阳 5

#### 鲁迅研究

周作人：白话翻译与汉语感知

文贵良 6

知堂题跋

张伯存 7

#### 鲁迅研究

跟着鲁迅学写作

王枚 7

#### 鲁迅研究

梦禅小考

——《鲁迅全集》中的一处误注

张娟 8

#### 鲁迅研究

因“保守”而创新

——评张先飞《“人的文学”：“五四”现代人道主义与新文学的发生》

关爱和 8

浅介日本《中国现代散文杰作选》

赵焯 8



纸墨香氛:记“书写的艺术——鲁迅手稿精品展”

夏晓静 87

文学巨匠心心相印,译文手稿字字存真

——《鲁迅译〈死魂灵〉手稿》出版研讨会综述

王倍倍 89

对话经典与梳理历史

——“经典作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贾丽萍 92



狄更斯《远大前程》插图一(黑白木刻,[苏联]布多戈斯基作)

狄更斯《远大前程》插图二(黑白木刻,[苏联]布多戈斯基作)

封二

狄更斯《远大前程》插图三(黑白木刻,[苏联]布多戈斯基作)

狄更斯《远大前程》插图四(黑白木刻,[苏联]布多戈斯基作)

封三

狄更斯《远大前程》插图五(黑白木刻,[苏联]布多戈斯基作)

封四

讣告: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先生逝世

36

主管单位:国家文物局

主办单位: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辑:《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

出版:北京鲁迅博物馆

印刷: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17年5月31日

发行:《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

地址:北京阜内大街宫门口二条十九号

邮编:100034

电话:(010)66165647

电子信箱:lxjyjk@vip.sina.com

海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 魯迅研究月刊

Lu Xun Research Monthly



2017.5



Lu Xun Research Monthly  
鲁迅研究月刊



狄更斯《远大前程》插图五  
(黑白木刻, 1936年, [苏联] 布多戈斯基 [E. Bodogosky] 作)

ISSN 1003—0638

CN11—2722/I

国外发行代号: M1083

装帧: 刘欣

定价: 6.00